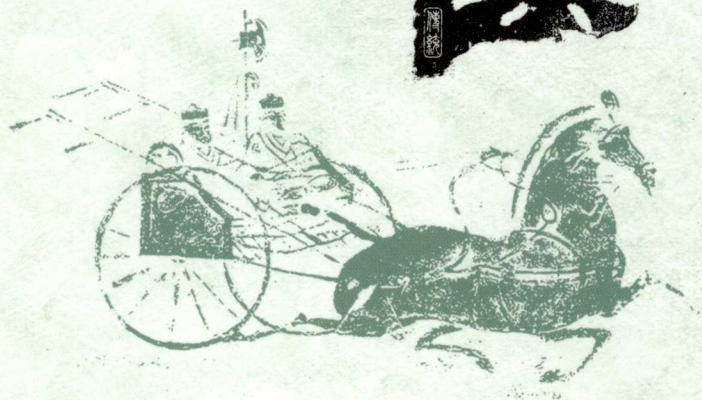


传统经典文献导读丛书

纪宝成 主编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 历代文选

胡娟 李立国 胡莉芳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G40-092. 2/2

2012

传统经典文献导读丛书

纪宝成 主编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 历代文选

胡娟 李立国 胡莉芳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C0031504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历代文选/胡娟, 李立国, 胡莉芳编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7

(传统经典文献导读丛书/纪宝成主编)

ISBN 978-7-300-16010-8

I. ①中… II. ①胡…②李…③胡… III. ①传统教育-教育思想-文献-汇编-中国
IV. ①G40-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2179 号

传统经典文献导读丛书 纪宝成 主编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历代文选

胡娟 李立国 胡莉芳 编著

Zhongguo Chuantong Jiaoyu Sixiang Lidai Wenx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19.75 插页 3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9 000	定 价	3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纪宝成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化中，形成了自己光辉灿烂的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不同的是，中华文化绵历数千年而未曾中绝，显示了其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关于这一点，学界的解释可谓见仁见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解读未尝没有道理，但据本人浅见，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乃是根植于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品格，在于其随着历史的演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汲取、熔铸新的理论学说，与时俱进，实现自我更新。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正是对中华文化这一品格的准确描述。汉代的经学，正如蒙文通先生指出的那样，是以儒家为主，对百家学说的一次去粗取精的整合。同样，唐代的经学、宋代的理学莫不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突破创新，形成新的理论学说。因与革、常与变、超越性与时代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两面。

当前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即是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发掘与扬弃。我们在注意到中华传统文化历史局限性的同时，更需要深入挖掘其超越性——那些在悠长的历史演变中不断完善、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富有生命力的部分和在旧时代旧体制下未能成长发达的灵根善苗。道理十分简单，无论是伦理道德、政治、教育还是经济领域，古人都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厚的宝贵遗产。

在伦理道德领域，古圣先贤致力于铸造与追求理想人格。“内圣外王”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而“内圣”又是“外王”的基础。自孔子以来，历代优秀的儒者莫不把理想人格作为修身的首要追求。因而，

理想人格也在他们的共同追求下不断完善。孔子提倡“刚”的品格，反对见利忘义；提倡“勇”的品格，主张杀身成仁。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至孟子光大之，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实质上是进一步弘扬了孔子对富贵的诱惑、贫贱的困扰和暴力的威胁的态度。孟子又提出“养吾浩然之气”说，这是对孔子提倡的理想人格的补充。这种大丈夫的品格和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作为人格修养的几乎尽善尽美的境界，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会过时，具有永恒的普世价值。这种精神和品格，在后来更多地表现为仁人志士在与恶势力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贞不屈、刚正不阿。如东汉张纲辞刺史不就，不顾个人安危弹劾跋扈将军梁冀；北宋包拯执法不阿权贵，被民间尊为“包青天”；林觉民牺牲自身，“为天下人谋永福”。他们的身上，体现的正是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可以说，这些仁人志士以他们的躬行践履、高风亮节，又将这种完美的人格发扬光大，并丰富了其内涵。

在政治领域，中华文化所提倡的和谐理念至为可贵。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已经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将“和”视为最理想的社会政治状态。至晏子，又以烹饪为喻，对“和”的政治理念作了进一步阐发。孔子及其弟子们也认为“君子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综合古人的思想观点来看，“和”应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元主导、多元共存、相济相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与“和”看起来相似实则相反的是“同”，就是容不得异己的力量、思想、意见，大搞高度统一。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凡是“和”的时代，都是充满生命力、创造力的时代；而以国家行政力量强行求“同”的时代，则大多万马齐喑，“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在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和”的时代少而“同”的时代多，这无疑是中国历史难以形成质的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和”的政治理念，虽经古人提出，但在旧时代并未能茁壮成长，是一株处于发育停滞状态的灵根善苗。十七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使“和”的理念在新的时代焕发出

新的生命力，并在社会政治建设中产生巨大影响。这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自我更新的典型代表。

在教育领域，中华文化有讲究师道尊严的优秀传统。师道尊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保证。“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真正的师道尊严，其实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师严”，即社会对于师的尊重，即使是贵为九五之尊的君主也不得臣，反映在社会层面，即是整个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二是“道尊”，也即对学术的真心信仰，学术不做政治、权力的奴婢。反映在政治层面，即是道统相对于政统的独立性及其对君权的制约。一面空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面以教育为政治的附庸，以权力奴役学术，而欲教育培养杰出人才，无异于缘木求鱼、痴人说梦！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王朝堕落到行政严密控制教育之时，堕落到“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謇謇之忠，习谄谄之辞”之时，也正是它的人才枯竭之时，随之而来的，只能是这个王朝的轰然倒塌。在大学日益行政化为衙门，教授沦为权力的包身工，中小学教师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人格尊严被肆意践踏的今天，而我们的教改又歧路彷徨之时，重温古人有关师道尊严的理念，也许能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在经济领域，古人很早就提出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思想。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认识到“恒产”是民“有恒心”的前提，因而提出“治民之产”的经济思想。经济建设如果不能为老百姓提供恒产，解决老百姓的生活保障，那么就不能带来社会的稳定与繁荣。这样的经济建设也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因为它注定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孟子把“治民之产”提到“王道之始”的高度。如何实现这一理想蓝图？《大学》中所引孟献子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这段话所传达的理念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就是说，国家不能与民争利，应斩断权力垄断利益的黑手。做不到这一点，放任既得利益集团以权力自肥，所谓“治民之产”

终将成为空中楼阁，而民无恒心的社会，也必将是危机四伏的社会，经济发展又如何能够持续？古人这些闪光的理念，对我们走向改革深水区的当今社会，也不啻是一服清醒剂。

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值得弘扬与发掘的，绝不止于以上这些。这里不过是以点带面，略加剖析。认真整理与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让这些优秀的思想与理念在新的时代重新焕发生命力，无疑对我们今天的社会道德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教育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自19世纪中期以来，古老的中华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开始了正面交锋，并很快在“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一败涂地。从此，从“天朝上国”美梦中醒来的有志之士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从未怀疑过的古老中华文化。与此同时，一种思想也在潜滋暗长：对中华文化进行全盘否定，并将中国落后于西方一股脑地归咎于中华文化——这种思想现在也有一定的市场。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那样，这种思想的错误在于片面强调中华文化的时代性，有意无意地忽略其连续性与超越性；片面强调文化与政治的关联，忽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把专制政治所结的恶果生硬地嫁接给文化。在他们看来，人类文明进入到以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为核心理念的近现代时期，已与君主制下重等级、德治的中华文化格格不入，否认曾经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价值。当然，随着近几年来国学热潮的风起云涌，也不乏个别人士对中华文化抱有盲目乐观的心态，甚至把中华文化中蕴含的一些理念当做拯救工业文明弊端的灵丹妙药——这种思想我在这里不准备再作批评，甚至也不觉有值得批评的价值。

正确理解和定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的前提。那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坐井观天式的文化保守主义都是要不得的。随着中华民族渐渐地崛起，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必将复兴，以独特的方式和理念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在这里，我大胆断言，这种复兴，既不会像某些坐井观天式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是传统文化的简单回归，更不会像某些民族虚无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是对中华文化的彻底革命，是根植于西方现代理念的重建，而必将

是一次凤凰涅槃，是中华文化在现代化大环境中的一次自我更新、与时俱进。这次更新，是对自身的扬弃，是对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吸纳与熔铸，是在专制集权政体下未能成长的灵根善苗的一次新生，让善的因素在新时代茁壮成长，成为中华文化自我更新的一部分。

这套丛书以弘扬与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文化建设添砖加瓦为理念，从伦理道德、政治、教育、经济四个领域，精心挑选了一批经典文章，前有解题，后加注释。选择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扬弃过程。限于编者水平，加之是一次尝试性的工作，缺憾与不足在所难免，其“择焉未精、语焉未详”之处，尚祈社会各界不吝指正。

目 录

导论	1
----	---

重教与教化

《论语》(节选)	21
《道德经》(节选)	29
《所染》	34
《兼爱》	37
《庄子》(节选)	41
《孟子》(节选)	46
《性恶》	52
《五蠹》(节选)	59
《大学》	63
《实性》	69
《汉书·董仲舒传》(节选)	71
《效力》(节选)	77
《超奇》	79
《难自然好学论》	88
《宋书·恩幸传》序	91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节选)	93

《原性》	97
《材论》	100
《河南程氏遗书》(节选)	103
《大学章句序》	105
《殿试对策卷》	108
《科举》	110
《学校》	113
《生员论》	118
《病梅馆记》	124

为师与教学

《论语》(节选)	129
《孟子》(节选)	147
《学记》	156
《保傅》	162
《师说》	166
《种树郭橐驼传》	168
《师友箴》	170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172
《贡院乞逐路取人状》	176
《论逐路取人札子》	181
《答祖择之书》	185
《袁州学记》	188
《师》(节选)	191
《师友》	193
《白鹿洞书院揭示》	194
《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	196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199

《教约》	202
《严师箴》	204
《广师说》	206
《漳南书院记》	209
《师说》	213

为学与治学

《弟子职》	219
《庄子》(二则)	223
《劝学》	226
《学行》	231
《勉学》	236
《进学解》	252
《学大原》	256
《伤仲永》	260
《日喻》	262
《石钟山记》	264
《颜子所好何学论》	266
《河南程氏遗书》(节选)	269
《读书之要》	271
《与内弟曾得宽》	273
《与学者及诸弟》	275
《与刘深父》	278
《与舒西美》	281
《赠武川陈童子序》	283
《读书分年日程》	285
《送东阳马生序》	287
《尊经阁记》	289

《梁元帝读书万卷犹有今日》	292
《黄生借书说》	297
《与是仲明论学书》	299
后记	303

导 论

教育思想是人类对社会和教育认识、概括、论证、思考的产物，是社会和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教育上升到自觉状态的标志。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特色鲜明、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先秦时期是中华民族教育思想的奠基时期，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由萌芽到比较成熟的时期。先秦诸子百家中，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孔子为儒家教育之奠基者，主张培养“君子”，倡导“有教无类”、“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其后，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从“性善”出发，从“内”入手，主张教以“明人伦”；荀子继承了孔子“礼”的思想，以“性恶”为基点，从“外”入手，力主“化性起伪”。墨家反对儒家的“礼乐”之教，主张培养“兼士”，重视知识学习、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和实用技术学习。道家秉持自然人性论，主张培养“隐士”和“隐君子”，力主“不以智治国”，提出“弃仁绝义”、“绝巧弃利”。法家主张培养“耕战之士”，提出“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儒、墨、道、法各有优势，但法家更勇于进取，利于统一，止于专权，为秦所用，一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思想。在汉代初期，以道家思想为中心的黄老之学也曾短暂居于主导地位。但自武帝始，儒家教育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几乎与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制度共命运、同始终。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内容，自西汉中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它始终为中国古代社会的

统治思想，在文化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作用巨大，影响深远。从中国文化教育传统发展的历史来看，儒家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为儒家的初创时期，儒学当时即开始成为“显学”。第二阶段是汉代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统治思想。第三阶段是宋明时期的理学，它成为后期儒家思想的主体，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思想并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动态变化发展之中，具有一定的兼容性与适应性。但是，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并没有改变其思想属性的相对稳定性。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谈和班固就已指出了这一点：“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①；“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② 概而言之，儒家教育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立在儒家道德伦理观念基础之上的。因此，儒家教育思想是以儒学的基本原理为依据，其特点是：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③，把修身作为教育的逻辑起点与中心环节，把治国平天下作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儒家经典是教育的主要内容，但在各个历史时期也有所不同；教学上强调自主性，强调知行统一，强调经世致用等。

人性论：儒家教育思想的理论依据

中国古代教育家往往通过研究人性，来探讨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或者说是寻求教育的理论基础。人性问题一直是我国古代教育家所集中研究的，是古代教育家所普遍关注的。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性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就已经成为当时思想

①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

②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诸子略》。

③ 《礼记·大学》。

家、教育家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孔子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①的观点。一方面是“性相近”，人性有其共性，一般性；另一方面是“习相远”，人性在后天受外力影响或改造可以朝不同方向发展。孔子的人性论承认人的差别受环境与教育影响，肯定了教育和学习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有力地冲击了以天命观为基础的“血统论”和宗法世袭观念。孔子之后，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对人性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分歧。孟子着重阐释“性相近”，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与生俱来便有“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② 人性本善，人的美德，是天赋而非外界施加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乃是“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虑而知”的“良知”^③。既然人性皆善，并且先天赋得，教育又有何用？孟子认为人虽有良能、良知等先天善性，但关键是能否存养得住。教育的作用就是收回散失的善性加以存养扩充，“学习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只要加强教育，努力学习，“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提出人性本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④ 但后天的改造可以使先天的人性恶变为后天的人性善，这就是教育的作用，“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通过礼乐教化，可以克服恶，求善向上。荀子和孟子在人性本质认识上虽有差异，但其宗旨都是一致的，即人性的最后立足点都是善。所不同的是，孟子主张“本善”，通过教育来保持和发扬性善的本能，可以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荀子则主张“归善”，通过加强教育以改造归乎良善，成为圣人，“涂之人可以为禹”。

汉代董仲舒调和了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矛盾，以及孟子“性善”和荀子“性恶”的对立，提出“性三品说”，即“圣人之性”是不教而善的，“斗筲之性”是教而不可善的，

① 《论语·阳货》。

② 《孟子·公孙丑上》。

③ 《孟子·告子上》。

④ 《荀子·性恶》。

唯有“中民之性”才是可教而善的。在董仲舒看来，圣人与斗筭都是极少数，绝大部分是“中人”，即普通人。这些人有“善质”，但必须通过“教化”，使“善质”转化为“善性”。从这个意义上出发，董仲舒一直强调“教化”的重要性，“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①。唐代韩愈主张“性品说”，重复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生来有品级，上品自然向善，中品需要教化，下品则不得不加以刑治。

宋代张载、二程和朱熹等人将气的概念引入人性的讨论，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前者是“人生所禀之天理”，是天然之“善”，“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②。后者则是人生而具有“禀气”的自然属性，有善有恶，“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在理学家看来，人的“气质之性”是可以改造的，人们只要不“自暴自弃”，坚持“用功克治”，那么，即使“下愚”之性，“亦有可移之理”^③。教育的作用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即存理卫道，去掉自己心中不合乎封建道德观念的欲望。

陆九渊、王阳明等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善的。既然人性本善，那为什么有恶的表现呢？王阳明认为，人之所以有恶的表现，就在于人的本心、意念由于追求物欲，为欲望所蔽，因而迷失本性，恶性发作。要改变这一切，关键在于通过自我道德修养，达到自我的道德觉醒，这就是“致良知”。所谓致良知，就是发现人心之本即良心，使其不为私欲所蔽，以表现本善，从而“复尽天理，灭尽人欲”^④。

古代教育家是从人性论角度认识教育问题的。春秋战国时期到汉唐时期的人性论观点多为经验认识或记述，而宋明之际思辨性和哲理性则明显增强。贯穿中国古代人性论始终的观点是认为人性本善，或者经过改造可以变善，故强调教育在教化万民、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正是

① 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十一《告子章句上》。

③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④ 王守仁：《传习录》上。

因为认识到人性有差异，圣贤之性高于百姓之性，从而论证了修身正心、礼乐教化以及严刑峻法的不同针对性与各自合理性，也论证了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教育，对于圣贤之人，应强调修身养性、率先垂范，而对于普通民众，则需要教化以安天下。

修身正己：儒家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

儒家要实行“仁政”，推行以德治国，就必须教化民众，使他们服从伦理道德规范。而要教化民众，就需要培养人才，使他们担负起教化天下的职能。如何培养人才呢？关键是修身正己。

《大学》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①“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环节中，修身是中心环节。

孔子提出教育就是要培养“修己以安人”、“修己治人”的统治人才——君子。君子首先要修身正己，然后才能安人、治人。统治者修身正己，是教育的中心环节，“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③，治人、治物、教化万民以治天下不过是治己的外化和扩大而已。“修己”是前提和基础，“治人”是结果和目的，但重点则在“修己”。

修身正己以明人伦为目标，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④。而为学、修身之序也有五项，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中前四项都是“穷理”的功夫。笃行的功夫又可以细分为：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并且要将上述各项都能“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知

①② 《礼记·大学》。

③ 《礼记·中庸》。

④ 《孟子·滕文公上》。